

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典範的移轉—— 建構淡江戰略學派之芻議

翁明賢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前言、國家安全戰略研究的概念與內涵、傳統視野下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戰略、建構主義的國家安全戰略思維、建構台灣的國家安全：「雙重平衡戰略」的思考、結語：兼論淡江戰略學派構建之芻議。

本文認為因應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興起，傳統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已經很難充分說明後冷戰時代國家的安全利益與安全戰略的真正內涵，因此，藉由建構主義國家身分決定國家利益的研究途徑與理論，本文提出另類建構台灣安全戰略思考，並進一步提出建構「淡江戰略學派」的可能性評估。首先，作者分析國家安全戰略研究的概念與內涵，次則了解傳統視野下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戰略，再則提出建構主義的國家安全戰略思維，從而建構台灣的國家安全：「雙重平衡戰略」，最後結語中，基於本所的時空環境優勢，建立「淡江戰略學派」正是一種挑戰與使命。

關鍵詞：國家安全、安全戰略、建構主義、國家利益、淡江戰略學派

壹、前言

自從 2008 年 3 月 20 日，台灣舉行第四次總統大選，政黨再度輪替，執政的國民黨馬英九總統提出類似 2000 年 5 月 20 日時，陳水扁前總統揭櫫之「四不一沒有」的「現狀維持」戰略，代之以「不統、不獨、不武」之「三不」「維持現狀」戰略。不同於 2000-2008 年間，北京對民進黨採取「聽其言、觀其行」，到「聽我言、觀我行」的立場變化，並透過「經美制台」戰略思考，協同美國進行「台海共管」策略，使得民進黨的國家安全戰略面臨極大之挑戰。

反觀 2008 年 5 月 20 日，國民黨執政之後迄今，兩岸開始大三通，並透過兩岸之海基會與海協會進行了四次商談，達成十二項協議與一項共識，此一共識：「金融監理備忘錄」(MOU)，也於 2009 年 11 月 16 日，經由行政院金融管理委員會出面，與大陸金融監理單位負責人，以專差換文方式達成簽署儀式。此外，中國觀光客陸續來台，台灣的國際參與也獲得改善，例如：2009 年 4 月首度被邀請成為「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的觀察員、2008 與 2009 年兩次由連前副總統參加「亞太經合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非正式領袖高峰會。在邦交國方面，也由於台北提出「外交休兵」理念，北京也無意進行挖外交牆角競賽。

但是，在野黨不斷批判執政黨此種「親中」或「傾中」的政策，讓台灣逐漸失去「主體性」，尤其是政府不斷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的簽訂，更令在野黨批判為「傾中」的具體呈現，讓台灣成為中國的經濟附庸，未來如果因而引進中國的農產品、勞工，或是大量低技術密集的製造業產品，會對台灣帶來更多的傷害。雖然馬英九總統不斷強調不會出賣台灣，但是會出賣台灣的水果（秦蕙媛，2009）。

事實上，馬英九總統的「維持現狀」戰略，基本思考在於：「中華民

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遵守「憲法一中」的規定，與北京所認知的「一個中國」原則還是有段差距。以往中國批判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採取「事實台獨」立場，北京無可奈何。但是，2004年以來，陳水扁第二任時期，採取台灣「主權獨立」的優先立場，被視為走向「漸進式台獨」。所以，2005年3月，北京祭出「反分裂國家法」，點名如果民進黨走向「法理台獨」，亦即突破台灣的國際法定位，不管透過「修憲」、「公民投票」或是公開宣佈「台灣獨立」，則北京會運用一切「非和平手段」，來解決所謂「台獨問題」。

另外，2008年12月3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紀念『告台灣同胞書』三十週年的紀念會上，提出「胡六點」，架構出未來一中促統戰略，與台灣簽訂『經濟合作協議』、『軍事安全互信機制』與『和平協議』，將台灣框架在此一中範疇下，如果台灣沒有比較積極、戰略性的思維，未來任何一黨主政，都無法擺脫北京對台的結構性制約因素。換言之，現行國民黨「維持現狀」戰略，也被解放軍解讀為「和平分裂」，如果沒有積極性思維，也會陷入中國對台統戰框架。

事實上，一般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學界，討論小國的安全戰略時，往往無法跳脫傳統國際關係上的「權力」與「利益」的糾葛，小國在先天上無法擁有強勢權力，來遂行其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不管採取「抗衡」、「扈從」、「權力平衡」、「集體安全」或是「軍備管制」與「中立主義」等等，都讓小國成為最後的犧牲者。因此，身為小國的台灣面臨強大崛起的中國，加上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結構改變，勢必要有新的詮釋角度，來省思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

是以，本文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安全研究、國家安全戰略研究的歷史進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如何詮釋此一國家安全戰略研究領域。其次，整理相關安全戰略研究的現況，分析學者對於此一議題的研究重點與研究途徑。再者，從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角度，提出另類的國家安全戰略制訂的思維與分析架構，釐清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思考與途徑。最後，透過

上述的國家安全戰略研究歷程，形成一個具有台灣特色的「淡江戰略學派」的初步構想與內涵，以為後續型塑「淡江戰略學派」達成「拋磚引玉」的效果。

貳、國家安全戰略研究的概念與內涵

一、安全的概念

一般研究國家安全涉及到安全概念、國家安全與安全戰略三個層面的問題。此處先釐清安全的觀念，國家遭遇何種安全威脅？透過何種戰略思考與設計，進而維護國家整體安全與發展。

首先，傳統思考上「安全」(security)此一概念通常伴隨著「威脅」(threats)與「危險」(danger)的狀態。「安全」意味著一方面外在環境不存在任何威脅，另一方面，亦沒有立即發生的危險事件。一般國家與社會都無法掌握「絕對」的安全，只有「相對」的安全存在，因為人類無法完全掌控所有影響安全的變數。

Barry Buzan (1991: 36) 提出字典對「安全」定義的解釋，包括「客觀」的安全：「免於危險的保護狀態」，或是「主觀」的安全：「感覺安全的狀態」，以及個人認知的信任：「免於懷疑的情勢」。換言之，上述所討論的「危險」與「懷疑」，都是相當不清楚、不完備，加上主觀感受的安全與信任，並不必然與實際的安全狀態吻合一致。

此外，安全也是一種極為難以解釋的觀念，誠如 Arnold Wolfers 所言：安全是一個「模糊的象徵」(ambiguous symbol)，因為它「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精確的意涵」(may not have any precise meaning at all) (Wolfers, 1962; Buzan, 1991: 4-5)。事實上，相對的，威脅 threat 概念會因人、因事而有所不同，大、小國也面臨不同的安全與威脅。

因此，Barry Buzan (1991: 7-11) 說明五種為何安全概念呈現持續不斷、低度發展的狀態的原因。首先，安全的概念被證明相當具有複合性的內涵，以致無法吸引研究者的興趣，因此往往被忽略，取而代之，從事較簡單的觀念研究；其次，在尖銳對抗的情勢下，安全與權力的意涵又有很大的重疊性，使得一般人忽略了安全概念的研究；第三、1970 年代末期，各樣反對現實主義正統教條的的思維並起，例如，理想主義者就反對現實主義者的模式，認為現實主義者的危險思維，會在一個核武軍備的世界，導向自我實現的戰爭；第四、然後，針對現實主義者的反動來自於相互依存的概念，因為相互依存的理念反映出如同環境、人權的多樣化，提供給安全觀念發展的學術性指引。第五、為何忽略安全概念研究之因，在於國家政策的實際操作過程，由於強制性的原因，必須要保持安全的象徵性模糊。

總之，安全可從「狀況」、「能力」與「關係」三個角度來界定（朱立群，2002：4）。首先在狀況方面，安全涉及主體的生命、財產與其他價值不受威脅的情況，是一種客觀的狀態，但是也與主體的主觀感受有關；其次，安全表現出一種適合自身能力使用與再生價值的能力；最後，安全是一種相對的觀念，是在比較下，與其他存在互動中產生的概念。誠如 Barry Buzan 所言，安全也是一種表示「相互關係的現象」(relational phenomenon)，理解任何一個國家安全的現象，不能不從安全相互依存的國際模式中去瞭解，因為安全是一種有關係的現象 (Buzan, 1991: 187)。

簡言之，安全概念的分析與界定包括下列四項：第一、安全是一種態勢，反映出主體在一定環境條件下，所處態勢的優劣；第二、安全的意義跟隨主體而存在，離開主體就無所謂安全；主體的種類從個人、團體、國際組織、國家；第三、安全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主體對自身安全狀態的一種感知，與判斷的結果，又是一種可以用客觀標準進行比較而得出的結果；既是不同主體之間相對關係的一種比較結果，又是主體自身與以往情況的比較結果；第四、安全做為主體存在的狀態，可以選擇若干狀態參數進行描述與分析（馬維野，2001：14）。

二、國家安全的意涵

「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一詞，如同安全的概念一般，也是充滿著模糊性的問題，為何稱之為國家安全？Buzan 指出安全維護的主體為「民族」(nation)，但是，國家安全議題並非只是關於「國家」與「民族」之間的連結關係，因為國家的組成並非只有單一民族國家的存在。換言之，國家內部的組成型態不一致，會影響國家安全的確定¹。

Harold Brown (1983: 4) 認為「國家安全」是一種「能力」的展現，亦即維繫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在許可的條件下，保持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維護國家的特質、制度與統治的正常運作，有效控制其國界的安定。傳統上，國家安全被視為防止外來攻擊的保護措施，主要只是因應軍事威脅的防衛工作，但在當代非傳統全球安全環境發展下，只思考軍事安全的角度是不足的。因此，Buzan 認為：「國家安全就是一個國家有能力維持其獨立身份與健全的功能²。」

美國學者 Ernest R. May (1992: 104-105) 認為從美國歷史發展經驗言，另外有下列兩個國家安全概念的經驗：第一，國家安全都被理解為包括外在與內部的層面，這些層面有時是相互補充，有時候卻是相互競爭的狀況，第二，當美國界定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安全關係時，通常美國的安全思維是廣泛的包括其他國家的傳統安全利益考量。

因此，國家安全應該是一種對國家「價值」的維護作為，而且價值是多元化，並隨著不同國家有其不同輕重緩急的考量。Helga Haftendorn (1991: 5) 以為，安全是在一段時間內，對價值或是體系的維持。換言之，狹義

¹ 關於民族與國家組成的關係，所牽涉的國家安全議題，請參見 Buzan (1991: 70-71)。民族 (nation) 一詞的拉丁文字根為「誕生」，隱含著人所出生而具有血緣關係的群體，而族群 (ethnic group) 源自希臘文的 ethno，指涉一個具有共同風俗習慣的民族概念；參見 Roskin 等人 (2002: 44)。

² 事實上，Buzan (1991: 116-34) 認為，國家安全威脅的層面包括：軍事、政治、社會、經濟和環保等五項。

的國家安全是指民族國家軍事力量與軍事戰略的穩定，隨著社會、經濟、技術、生態等的劇烈變化，形成廣義的國家安全觀念，是一種綜合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生態等的安全狀態（龐中英，2002：158-59）。

其次，關於何種威脅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影響，並成為必須處理的議題，一般而言，除了威脅的形式外，相關當事國如何認知此一威脅，同時也要兼顧威脅所型塑的衝擊強度，影響威脅強度的因素包括：威脅主體的明確性、空間與時間的緊迫性、發生威脅的機率、威脅後果的嚴重性、及經由歷史的過程，增強了威脅的認知（Buzan, 1991: 134）。

此外，如果以國家安全為基礎的國家利益此一概念來解析國家對外行為，可以區分為兩種國家安全，其一、狹義的國家安全，主要論述國家免於受到另外一個國家之領土侵犯，主要考量國家的軍事安全議題；其二、廣義的國家安全，一方面指國家的綜合安全，在國家為主體的思考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安全面向，都是國家要兼顧的安全考量。另一方面的定義則是超出國家的範圍，強調要從全球範圍下思考安全議題，因為全球層面上所產生的偷渡、犯罪、飢荒、疾病、人權等問題，也會衝擊個別國家的安全（秦亞青，1999：51-52）。

三、安全的層面與安全戰略

（一）安全的層面

關於安全的分類，一般從層次來區隔為「國家安全」、「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與「世界安全」（world security），也有學者將「區域安全」（regional security）、「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與「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列為重要的研究面向。上述安全層面的關係，基於其維護價值的不同、威脅來源與因應能力的差異，呈現不同的研究途徑與結果。

基本上，國家安全是這些安全層面的基礎與主體，一方面，國家是實現安全的主體，另外，國家又是實現安全的目的，不管在何種層面上，都

是要完成國家的安全（李少軍，1998：152-53）。因此，當一個主權國家為達成它以主權國家的身份生存於國際法的當代國際體系，而從事的各種努力，可稱之為「國家安全」之維護（陳必照、林正義，1995：33-34）。國際安全則是二次大戰以後新興的一門國際關係的次學科，它研究的對象是指涉國際社會的生存、穩定、和平與穩定的安全環境，及其相關連的機制與條件，國際安全與國家安全是不同的分析層次。

不過 Buzan（1991：52-55）強調：安全並非只是單一透過國家安全議題的處理就可以達成其目的，他認為思考國家安全問題時，也不可偏廢以個人為導向的安全思考。首先，個人或次國家團體在其自身的利益考量下，成為國家安全必須處理的課題，例如，刺客、恐怖份子、分離主義者、政變推動者及反政府革命份子，這些都對國家形成嚴重威脅；其二，直接與國家內部安全有關，因為一國人民有可能扮演支持其他國家利益的第五縱隊作為，例如 1930 年代，納粹德國在法國的破壞活動、冷戰期間莫斯科在全球各地支持的反政府行動等皆是；其三，個人亦可以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對國家施加各種壓力以影響國家安全的建構，例如，透過輿論媒體的操控，進而左右政府政策的制訂；其四，基本上，由於個人扮演國家政策的領導角色，個人的安全觀與認知，都會影響國家安全的思考。

（二）戰略與安全戰略

關於「戰略」（strategy）、「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與「大戰略」（grand strategy）三者的關係有必要加以釐清，為本文後續之安全戰略與安全政策分析的基礎。

何謂「戰略」？中國唐代詩人杜甫的「前出塞」一詩：「挽弓當強挽，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中國軍事戰略學者李際均認為，此一詩詞並非騎兵的戰術要領的描述，而是一種「戰略思維」，表達：「擁強兵而反黷武，

操利器而避殺傷，制侵陵為根本之計，保國土而不越疆³（李際均，2001：16）。」

基本上，戰略是一種決策的整體過程作為，也是一種國家體制與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並有如下的五點特徵：1.戰略是一種有意圖性的思考，是一種長期性有計畫，以完成某些既定目標的思考；2.針對國家面臨的環境與其他國家行為體的考量與作為，戰略是一種可操作性的行動；3.戰略抉擇是一種系統性的思維，而非只是一件有組織的行動，有系統的政策作為表明今日的決策行為，會直接影響明日的國際困境發展；4.戰略抉擇是包含辯證性意涵，他假裝一個存在的敵人，或是虛擬一個對手，並思考如何因應之道；5.戰略抉擇是一種政治性的行動，因為他涵蓋更高價值的優先順序問題，諸如：安全、福祉、人權及其他抽象與具體的渴望事物，政治價值一方面是國家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國家可分配的事物（Cimbala, 1984: 1-3）。

其次，戰略（strategy）是「目的」（end）、「途徑」（way）與「工具」（means）三者之間計算之後的相互關係（參見下圖 1：戰略購成要素圖）。目的或目標為國家追求的標的，工具為國家所具有的各项資源，而方法為如何整合相關資源，加以運用的方式，三者之間型塑以下三個問題？首先，國家要完成何種目的？其次，運用何種工具來追求此目標？及運用何種方式來達成此目的？（Manwaring, 2003: 128）。

同時，戰略思維時也要注意兩個課題，其一、如果進行戰略思維評估時，最重要的是確定目的為何？其二、在確定目的之後，選擇適宜的目標（proper objective），比選擇恰當的方法與工具更為重要，因為戰略思考的關鍵點不只是一種效率的追求（efficiency: doing things right）。同時，更加重視有效性的問題（effectiveness: doing the right things），所以安全戰略的型塑過程，最重要的核心思考在於：「先去理解未來我們前往的方向，我們

³ 薛釗在其《戰略性思考》（2001：57）一書中提出：「戰略就是一種行動的指導，其目的在研究以合理、有效的行動，達成目標。」

運用何種工具來達到該目的，以及如何最佳的運用那些工具，盡可能的有效率與有效的達到該目的」(Manwaring, 2003: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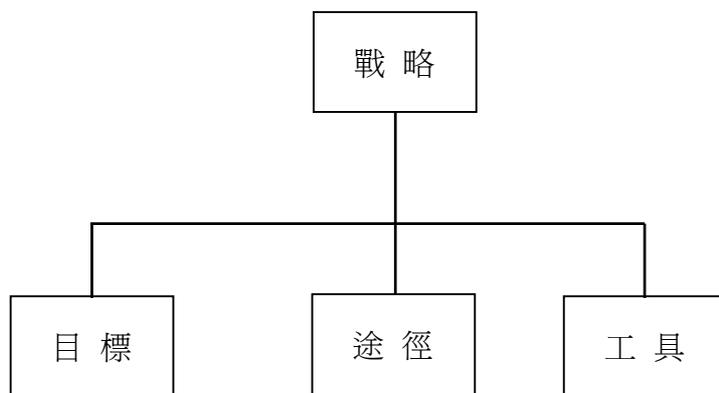


圖 1：戰略構成要素圖

另外，戰略制訂的依據標準在於「國家利益」，如同李際均所強調：「國家利益是戰略的最高準則。任何戰略思想與戰略方案的提出都是為特定的國家利益服務的，從來沒有超越國家利益之外的戰略（李際均，2001：153）。」薛釗提出所謂「戰略性思考」，在於「希望國家戰略階層的規劃者、籌畫者在思考國家重要政策時，能夠「think strategically」一以整體性、前瞻性、主動性、實踐性的戰略「基本」特性思考問題（薛釗，2001：13）。

所以，一個國家必須根據其追求的國家利益與價值，思考國家在國際社會體系中，會受何種外來的影響、威脅與挑戰，進而確定其欲完成的目標，同時，使用國家的權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途徑，來促進與保持國家的利益發展，就成為國家安全政策的具體內涵。

Buzan (1991: 112) 認為，思考安全政策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如何區分「威脅」與「易毀性」(vulnerability) 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國家安全政策可以將其重點置於國家內部的作為，來減少國家面臨武力攻擊時的易毀性，或經由減少外部的安全威脅。事實上，國家安全政策與其他國家相關政策不同，在危急存亡之下的國家安全決策，所涉及的價值都與國家的

生存、凝聚與特質有關連，是以，國家安全政策具有戰略性的思維，目的就在建構適合國家戰略目標達的一個可操作的安全環境（Cimbala, 1984: 1）。

參、傳統視野下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戰略

一、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戰略

基本上，國家利益不僅是「模糊」的概念，有時候甚至是毫無意義的觀念，因為很難去定義甚麼是「利益」？也很難確定「特殊利益」(particular interest) 與「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之間的關係；其次，國家利益針對思想與行動言，往往是一種非期待式 (undesirable) 與甚至危險的指引，因為它沒有辦法真正的反映出多元社會中，相互爭辯的聲音，有時也會鼓舞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態勢，不符合當今相互依存的世界，而且，如果以更高的倫理標準言，也是一件道德上沒有辦法被支持之事 (Friedrich, 1962; Schubert, 1960; Clinton, 1994: 21)。

根據美國學者 Charles Beard 於 1934 年出版一本名為《國家利益的觀念：美國外交政策的分析性研究》(*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An Analytical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起初並不存在現代意義的國家利益觀念，而是先從「君主意志」、「王朝利益」、「國家理由」再到「國家利益」觀念的形成 (Beard, 1934: 214; 方長平, 2002: 3)。倪世雄 (2001: 251-52) 整理國家利益的概念分三個階段，國家至上階段、王朝利益階段與國家利益階段，並強調只有主權國家出現的情形下，國家利益的概念才會存在，所以，國家利益應是：「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維護本國和本民族免受外來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則」，也是「國家制定對外目標的重要依據和決定因素」。

一方面，與國家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與經濟繁榮有關的事項，就是國家利益的所在，再則，國家利益就是政府與人民的認識、期望、信念、

立場與目標，認定與國家的生存、安全、發展及福利具有密切的關係。所以，需要一國全力維護與推展的事項（程天放、張彝鼎，1973：214）。簡言之，國家利益是指一個國家人民與政府，特別是決策者認為值得追求的公共需要或是目標，而這些需或目標不外乎指：國家的生存、安全、秩序、自由和福利等有關的諸種事務⁴（張之傑、黃台香，1984：1067）。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戰略研究部在 2001 年出版了一本全軍戰略研習教育的教科書《戰略學》，其中第二章 決定戰略的諸要素一文中，非常突出「國家利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國家利益「是一個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客觀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的總和」，並且也是「決定一個國家軍事戰略走向的基本依據，是國家軍事戰略指導的出發點與歸宿點（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2001：40）」。

關於此點中國學者秦亞青就明確的指出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國家利益是一個民族國家對外政策的指導原則與基本動因（秦亞青，1999：65），所以，從上述的簡單定義得知，生存與發展為國家最重要的利益，利益的內涵包括有形物質與無形的精神層面。

國家利益的內涵不外是國家之安全、經濟與發展三項，首先，安全對一個國家言是追求生存的基本保障，亦是最重要的國家利益；其次，只有國家經濟繁榮，才有力量支持國家安全與社會發展（程天放、張彝鼎，1973：214），國家利益的內容雖包括上述三項，不過，一個國家的資源與權力是有限度，必須根據其政策的優先性質，平衡的發展此三個層面。Ivo D. Duchacek 以為國家利益的成分包括五項：（一）國家有形的本體＝國民；（二）國家的信仰：民主、自由與平等；（三）政治制度；（四）領土的完整；（五）經濟制度等五項（張之傑、黃台香，1984：1067）。

⁴ 至於國家利益的定義，學者 Clinton（1994：25-32）整理出五個不同的界定類別，首先，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是否為一個社會中，特殊之次國家利益的總合，是一件大有疑問之事；其次，國家利益是一種政策的制定過程的結果，或是國家主要決策者的優先考量，同時，國家利益也與政權的形式有關，不同的政權有不同的目標，需要透過不同的外交政策來追求其目標；最後一種是把國家利益界定為權力，不管其國家占優勢的哲學理念為何！

事實上，國家利益亦可從「相對性」概念來區分為：「重大對次要」、「暫時對永恆」、「特定對普遍」、「互補對衝突 (Roskin, et al., 2002: 408)」。

每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狀況，會有不同的國家利益的需求，如何進行決定，涉及複雜的多元因素。換言之，國家利益不是一種單一的概念 (the national interest)，而是複數的國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s) 觀念，因為從單一國家立場言，其在整體的國際政治上，在危急存亡關頭下，有其必須追求的國家安全利益，同樣的狀況，在易毀性高的國際社會中，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訴求與利基。這些複數的國家利益要求每一個社會，通嘗試透過其國家的方式，從外在世界獲得其國家利益 (Clinton, 1994: 55)。

二、傳統國家安全戰略的設計

從上述國家安全概念與安全戰略內涵的分析之後，從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分析一國安全戰略的思考與設計，呈現在理論假設、分析單位、主要工具、後冷戰預測與主要限制的不同 (參見下表 1：國際關係三大學派比較表)。

表 1：國際關係三大學派比較表

比較範式	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建構主義
理論假設	自利、國家持續追求權力與安全	從政治與經濟觀點思考權力的追求、致力於自由價值	菁英的信念、集體規範與社會身份影響國家行動
分析單位	國家	國家	個人 (尤其指菁英份子)
主要工具	經濟與尤其是軍事權力	各色各樣 (國際制度、經濟交換、民主提升)	觀念與話語
代表學者	Hans Morgenthau, Kenneth Waltz	Michael Doyle, Robert Keohane	Alexander Wendt, John Ruggie
代表著作	Waltz (1979) Mearsheimer (1990)	Keohane (1984) Fukuyama (1989)	Wendt (1992) Koslowski & Kratochwil (1994)
後冷戰預測	強權國家競爭的公開再現	自由價值與開放市場的加強合作，以及與國際制度的擴散	未知的，因為無法預知觀念的內涵
主要限制	並未思考國際的變化	企圖忽略權力的角色	長於過去的描述，拙於對未來的預測

資料來源：Walt (1998: 38)

一般傳統研究國家安全的理論與途徑，包括：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與途徑。現實主義學派強調權力，透過國家權力的建構，在一個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國家透過自助方式，自行建軍備戰，求取國家安全，或是透過集體安全、權力平衡、聯盟等途徑；自由主義則強調利益為主要分析概念，強調在無政府狀態下，透過國際法、國際組織、國際建制的運作，達到經濟利益相互依存的效應。

本文藉由比較現實主義學派與自由主義學派對於國際社會的研究，呈現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不同⁵。基本上，現實主義學派強調權力（power）為核心研究的焦點。尤其是以華爾茲（Kenneth Waltz）為主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又稱之為結構現實主義學派（Waltz, 2003），強調國際體系的結構的變化，對於國家行為的影響深遠。一般分析國際政治可以從三個面向加以瞭解，首先是國際體系變化，其次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再者是國家決策者的因素。上述三者都會影響國家對外政策與實際作為，任何一個國家決策者在制訂其國家安全戰略時，都必需思考如何平衡此三者的優先順序關係。

研究國家利益與安全戰略時，國家為國際政治體系最主要的行為體，同時，國家也成為世界秩序的主要維繫者，學者 Hedley Bull（2003: 230-32）以為國家體系有助於維持一個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暴力衝突不是因為國家體系的存在而產生，吾人從理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待國家體系，亦可以在此體系下建立多元安全共同體；其次，國家體系在面對處於嚴重分裂狀態下的人類共同體秩序時，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其三，面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虞，唯有國家可以進行有效管制的角色。

中國軍事戰略專家彭光謙在「環球時報」撰文提出，國家安全戰略重心由維護生存利益，走向維護發展利益，要求中國更清楚認識所面臨安全威脅的新型態，新特點。換言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首先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處理好。其次，力足以實力求和平，以實力保發展。第三、要高度重視強化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憂患意識與自強不息精神（無作者，2009b）。

⁵ 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的討論，請參考 Derian（2003）。

2009年5月，俄羅斯頒佈由梅德韋傑夫總統批准的「2020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此為俄羅斯獨立以來兩版「俄羅斯國家安全構想」之後的第三份國家安全戰略文件（柳豐華，2009）。在國際情勢方面：俄羅斯面臨北約東擴、反導系統、全球與歐洲一大西洋地區安全結構的挑戰；第二、遠期國家利益為發展民主與公民社會，提高國家經濟競爭力，捍衛憲政體制、領土完整與主權，著重於國防、國家與社會安全；第三、戰略目標在於：國防、國家與社會安全、提高公民生活質量、經濟增長、科學技術與教育、醫療、文化與衛生、文化、生態保護與自然資源、戰略穩定與平等戰略夥伴關係；第四、戰略形成了一種新的統一國家與社會的努力與資源，維護國家安全的機制。

美國學者 Joseph Nye (2002: 154) 提出實現國家利益與安全的途徑，換言之，美國如何與他國打交道，進而獲取其最佳國家利益與安全狀態，包括：傳統思維下的「孤立」(isolation)、「單邊主義」作為(unilateralism)與「多邊主義」途徑(multilateralism)。Nye (2002: 154-63) 覺得面臨全球化安全環境的變化、傳統與非傳統威脅交互盛行的情勢下，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他建議考量以下七種狀況採取單邊與多邊混合的策略，其一、涉及生存的根本利益時，不排除單邊主義的行動，但也要盡可能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持行動；其二、必須防止一些多邊機制的運作，影響到美國在一些敏感地區建立和平與穩定的能力；其三、單邊主義作為有時候亦可引導其他國家，進行多邊利益的妥協工作；其四、美國要反對那些專門促成他國的私利、或與美國價值觀相左的多邊倡議行動；其五、涉及多國問題非美國單獨所能處理之事項，基本上就是多邊主義的作為；其六、透過多邊主義途徑，形成一種誘因來使得其他國分攤費用，出資支持提供公共財的主張；其七、在單邊或是多邊策略的選擇上，必須考慮對美國「軟權力」造成的衝擊⁶。

基本上，Posen 及 Ross 提出不同的角度美國的「國際安全戰略」，有時稱之為美國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美國必須回答下列的問題，

⁶ 關於美國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理論之爭辯，亦可參考 Patrick (2002)。

例如：美的國家利益與目標為何？對這些利益與目標的威脅為何？哪些為恰當的戰略回應措施？哪些應該是美國戰略與政策的指導原則？簡言之，美國應該採取何種新的大戰略？他們提出四種大戰略作為提供給美國政府思考其在世界政治的角色包括：新孤立主義（neo-isolationism）、選擇性接觸（selective engagement）、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以及美國優勢作為（primacy）⁷。

事實上，不管追求國家利益的單邊、孤立或是多邊作為，都攸關國家安全的戰略設計作為問題，思考國家安全戰略首先要從國家所追求的「價值」（the values）著手，國家安全戰略的目的就是在於運用何種手段來保護國家的重要價值的整體機制。例如，美國要維護的國家價值不外乎為：人性尊嚴、人身自由、個人安全、倫理準則，以及幸福、和平、繁榮的追求（Manwaring, et al., 2003: 117-18）。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就是基於上述的價值考量，而型塑的一整體安全戰略架構。一般而言，此安全戰略架構內涵包括：1. 戰略視野的建立；2. 國家安全利益的確定；3. 相關連的國家目標來支撐這些利益；4. 達成這些利益與目標的方式與工具；5. 基本的觀念性、組織性與運作性工具，來完成上述之各項目標作為（Manwaring, et al., 2003: 118）。

美國學者 Nye（2002: 147）的分類跟上述學者的看法不同，他認為保護美國的傳統根本利益，以及全球公共財（global public goods）的大戰略，是其國家利益的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屬於人權與民主的範疇。基本上，Nye（2002: 143-44）以為美國的「大戰略」就是要確保美國能夠生存，其次為提供全球公共財⁸。提供全球公共財的利基在於，美國可以得到雙重優勢，其一為公共財本身所帶來的利益，其二為其他國家承認美國權力的合法性。

⁷ 關於四種實現美國大戰略的途徑可參考 Posen 與 Ross（1997: 1-5）。

⁸ 全球公共財包括：在重要地區維持力量平衡；推動開放性經濟；保留國際共用權；維繫國際機制與組織；提供經濟援助；擔負起聯盟召集者與發揮爭端協調者角色，參見 Nye（2002: 147）。

所以，生存為國家最重的利益，提供全球公共財給予世界其他國家，除了促進其他國家的發展外，美國事實上從中的得到最大的國家利益。總而言之，美國的主要國家利益包括下列五項：首先，建立一個健全的、成長的美國社會與經濟，俾得以提供每一個個體致富的機會；其次，提供一個政治、經濟與穩定的世界；再者，保持國家的自由與獨立，保護其基本的價值、體制、人們與領土完整；然後，從國內、外產生領導與知識，形成對美國觀點、價值與動機的認可（Manwaring, et al., 2003: 118-19）。

三、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思考

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的意涵為何？首先要瞭解「國家安全」的內涵，根據民進黨執政時期，由國家安全會議提出的「2006年國家安全報告書」，具體指出：「為了提高政府施政透明度，凝聚國人對於國家安全的共識，政府有責任告訴人民：當國家面臨內外威脅、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政府擇定的戰略目標。」（國家安全會議，2008：3）

因此，「國家安全戰略」係指政府在有限的資源下，依據對安全情勢的評估，瞭解安全威脅的來源，進而確立國家安全議題的優先處理順序，釐定確保國家安全的策略，讓政府有效指導近期程內的施政方針，有效分配與運用國家資源，保障國家生存與人民的安全（國家安全會議，2008：3）。

對於台灣而言，國家安全面臨三個不同層次的國際體系與兩岸關係結構上，其一、長久以來處於全球大戰略的架構，其二、與美中兩強的區域權力結構，其三、加上兩岸關係發展的雙邊權力互動結構。從馬政府上台以來的國家安全思考，及其具體政策作為，似乎無法脫離上述的權力結構。

2009年12月24日，國安會秘書長蘇起首度公開國家安全領域事務與國安戰略原則。在國安領域範圍上，國安會主管三項議題：一、通案：活路外交、兩岸談判；二、馬總統關心的個案：美國牛肉進口問題；三、沒有先例的個案：是否參加上海世博會、中國直昇機援助案。在國安戰略上，蘇起從台灣面臨的國際戰略情勢著手，強調台灣面對美國、日本、中國等

是「三大之間難為小」，上述三國力量加起來為 40%，台灣卻只有 1% 面對一比四十的力量中，台灣必需廣結善緣，是以，政府的政策主軸為：「和中、友日、親美」來維持安全繁榮（江慧真，2009）。

事實上，2008 年 5 月 20 日，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秉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之原則，推動「不統、不獨、不武」的「維持現狀」戰略下，在外交上，強調「活路外交」，與對岸進行「外交休兵」。台灣改變以往的積極性參與國際組織的作為，例如：2008 年改變參與聯合國策略，代之以參加聯合國周邊組織活動為訴求。在兩岸關係上，基於「對等、尊嚴、互惠」原則下，恢復兩岸制度性協商管道；在國防上，採取「守勢戰略」，謹慎思考對美軍售問題，也不排除進行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討論。

上述這些政策被在野黨批判為「傾中」或是「親中」政策，尤其是 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錦濤提出對台六點指示，強化與台灣進行『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軍事安全互信機制』與『和平協定』的簽訂。台灣方面及不斷的朝此方向前進。例如：從 2008 年 5 月 20 日以來，海峽兩岸透過兩會：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四次商談，通過十二項協議與一項共識，事後都沒有經過立法院的審查，都以行政命令方式加以推動。另外，經濟部規劃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不斷被民進黨批判，認為國民黨在建立「一中市場」，未來走向與中國的經濟統合，達到統一的目標，基本上，國民黨就已經是偏離其所謂「維持現狀」戰略考量。

其實，早在 2008 年 2 月 26 日，總統競選期間，馬英九出席一場由中華民國國家安全促進協會的圓桌論壇暨九十七年會員大會，提出台灣的國家安全要奠基在一個 SMART 的概念上，S 就是「軟實力」（soft power）、「軍事嚇阻」（military deterrence）、「保證現狀」（assuring the status quo）、「修補互信」（restoring mutual trust）等四項，就是一個 SMART 的概念（陳亦偉，2008）。換言之，台灣唯有「以智取勝，才能在中國大陸崛起下持續發展茁壯。」同時，「把台灣國際化」，變成亞太的經貿、文化樞紐、人文薈萃的地區，才能增加台灣的安全，降低中國動武念頭（陳亦偉，2008）。

馬英九政府的「兩岸優先政策」，使得美、日與歐洲盟國擔憂，此種過度「傾中政策」，使得台灣變成以北京為馬首是瞻的芬蘭化附庸國家身份，終究不利於西方盟國的國家利益。例如，2008年馬英九初上台之際，發生台日漁業糾紛，馬政府的處理態度，彰顯台北「聯中抗日」的聲調甚囂塵上，爲了避免失去日本此一重要與國支持，國民黨政府強化對日關係的建構，建立台日關係行動年。

另外，爲了爭取美國的支持，以「重建互信」爲對美外交的主軸。也爲了表現出一個平衡的美中關係，透過國防部《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QDR）與《98 國防報告書》，突顯出台海軍力失衡現象，要求美國對台出售 F-16C/D 戰機，並不斷展現台灣建構國防力量的決心，也將厚實的軍力，視爲未來與北京談判的重要籌碼。

在兩岸定位方面：接受墨西哥太陽報的訪問時，馬英九強調：海峽兩岸的關係應該不是兩個中國，「而是在海峽兩岸的雙方處於一種特別的關係。」主要在於中華民國憲法無法容許在領土上還有另外一個國家，中國的憲法也有同樣規定，所以，雙方是一種特別的關係，但並非國與國的關係（林沂鋒，2008a）。馬英九總統認爲目前政府無法解決此一問題，卻可以做一個暫時的處理，就是 1992 年兩岸政府所達成的一個共識，亦稱「九二共識」，雙方對於「一個中國」的原則都可以接受，但是對於「一個中國」的含意，兩岸有不同的看法。主權問題很難一時加以解決，政府應將重點放在更需雙方解決的項目，就是政府推動的政策（林沂鋒，2008b）。在外交方面，希望兩岸不再惡性競爭，繼續維持邦交國，對於無邦交國還是可以發展非外交關係，達到和平共存，才是兩岸國際相處最理想的方式（林沂鋒，2008b）。

針對飛彈問題時，2009 年 8 月 26 日，馬英九總統接受墨西哥《太陽報》系統集團董事長瓦斯蓋茲（Mario Vazquez Rana）訪問表示，將來與中國發展和平關係時，會要求對方簽署和平協議，會要求對岸處理飛彈問題，因爲台灣不願意在飛彈威脅下進行和平談判。在兩岸關係方面，馬英

九強調中國大陸是威脅，也是機會，政府要將威脅極小化，一方面機會極大化。首先要促進雙方更密切的交流，讓雙方可以用非武力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預防武力攻擊之時，政府要有嚇阻力量，讓中國根本不會做此種攻擊的準備（林沂鋒，2008c）。

2009年12月28日，外交部向七十多名駐外使節與代表說明第四次兩岸江陳會的內容（劉曉霞，2009）。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說明政府的思維事先談相對較容易的經濟議題，累積更多的互信之後，再來進行難度較高的政治議題。換言之，對兩岸議題採取「先經濟後政治」的立場不變。另外，政府也強化與中國的社會與文化交流關係，教育部也公布承認中國大陸四十一所高校的學歷。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表示未來開放中國每年來台學生人數為兩千人，相對也希望中國被承認的四十一所高校相對招收兩千個台灣學生（林曉雲，2009）。

事實上，整理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的五大軸線（楊偉中，2009）：軸線一：戰略模糊 雙方各自表述：在就職演說中，馬英九總統強調：「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1992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軸線二：等邊三角 平衡大國關係：蘇起曾經提出要理解兩岸關係，同時要抓住三個角（美中台各自內部因素），三個邊（兩岸關係與美國與台海雙方關係）等六個因素；軸線三：摸索活路 兩岸牽動外交：馬英九出訪、巴拉圭、薩爾瓦多維持邦交、APEC 非正式領袖會議、參與 WHA 為觀察員等等；軸線四：經濟跨帥 繞過政治分歧：務實面對中國巨大經濟實力的結果；軸線五：多軌並進建立溝通機制：兩岸之間形成：海基海協、主管官員、國共兩黨、雙方智庫多軌並進，全方位溝通機制。

肆、建構主義的國家安全戰略思維

一、建構主義的身份主導利益與戰略

事實上，誠如前段分析結果，透過兩岸經貿往來，以「參與」和「擴大」兩岸經濟利益，累積一定政治互信之後，再來進行兩岸的政治談判工作。同時，要求中國撤除對台飛彈部署，強化與美國安全合作關係，基本上，無法跳脫傳統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角度論述，對於台灣目前的國家安全戰略，總是無法克服「安全困境」的糾結。亦即在美中台三邊戰略架構下，台灣始終為美中權力競逐的標的，台灣無法從「權力」與「安全」的角度，爭取台灣最大的國家安全利益。而在兩岸架構下，馬英九採取「先經濟、後政治」的戰略思維，某種程度言，就是一種「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的思維，透過低階議題的合作，走向高階的政治議題，從目前的現況言，台灣很難避免只談「經濟議題」，而不得被迫去協商「政治議題」的困境。

事實上，九十年代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出現，引導研究者從非物質層面一從不同「無政府文化」（anarchy culture）下以及「觀念」（ideas）來理解國家之間的利益紛爭，認為國際社會的行為體，透過互動產生不同無政府文化，進而影響觀念形成，從而確立國家相對應的身份，主導國家的利益與政策的施行，提供研究國家安全戰略的新途徑。

是以，本文藉由溫特（Alexander Wendt）所提出的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假設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安全制度研究都有其不足之處，建構主義強調國際社會存在多元無政府文化，國家間經由互動過程產生不同的無政府文化，透過文化類型確定國家的「身份」與「利益」，並進而引導國家戰略與政策的推動⁹（請參考圖 2）。

⁹ 有關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論述，請參考 Wendt（1999）；至於實際運用於國際、美中關係問題，請參考翁明賢（2008）、翁明賢、吳建德（2006）、翁明賢、李黎明（2007）、翁明賢、周湘華（2006）。

基本上，一旦行為體內化了這些「身份」，就具有兩種特徵：領悟自己的要求，並根據此種領悟採取行動¹⁰。亦即身份主導國家利益的追求，國家的行為受到身分與利益的影響，也受到國際體系的影響，國家的身分與利益與國際體系形成建構關係。這有別於傳統國際關係理論認為國家身分與利益不受國際體系影響，但是國家行為則會。國家的身分與利益除了內在因素所構成，大多是由國際體系的結構所造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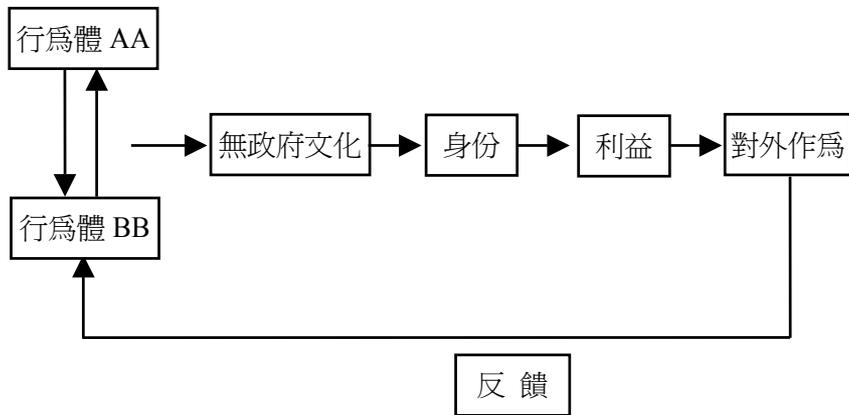


圖 2：國際行為體互動架構圖

資料來源：翁明賢（2009：41）。

說明：

1. 根據溫特建構主義理念，兩行為體互動過程，形成不同程度的無政府文化，包括：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代表三種主體位置：敵人、競爭者與朋友的態勢；
2. 基於不同的無政府文化，界定兩行為體的四種不同的身份關係，包括：個體與團體、角色、集體等，行為體同時擁有不同的身份關係；
3. 基於身份主導利益走向，行為體的利益種類包括：生存、獨立自主、經濟財富與集體自尊等四項，行為體在不同利益的主導下，從事一定的對外行為；
4. 透過回饋的過程，行為體的政策作為會再次影響行為體的互動過程，及其之下的無政府文化的走向、身份生成與利益的建立。

¹⁰ 上述特徵只能間接的解釋行動，因為行為體希望知道自我身份需求此一事實，並不代表行為體可以正確預測這些需求。因為，有時行為體錯誤的解讀，或是受到蒙蔽，就會採取違背真實需求的行動。見 Connolly（1983）。

因此，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假定「無政府文化」，自然參與了國家身分與利益的建構。但是新舊現實主義所認定的無政府狀態是一種霍布斯文化的結構，國家會從事軍備競賽、權力平衡與戰爭等手段，但是建構主義認為無政府文化不是只有單一的結構與邏輯，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至少取決於三種角色：「敵人」、「競爭者」、「朋友」所形成的政治文化。

所以，從溫特建構主義的思考邏輯角度，國家決策者根據國家所具有的客觀利益，經過決策者本身的評量，確立整體性主觀國家利益的優先順序，因而確立國家施政目標與方向，指導國家對外作為，亦即戰略與政策的形成¹¹。

二、建構主義的身份類別與意涵

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如同在國內社會中的個人一般，可以擁有不同的「身份」(identity)，而身份的獲得必須歷經不同的程序與規定。溫特認為國家有四種身份：「個體」或「團體」(corporate identity)、「類屬」(type identity)、「角色」(role identity)與「集體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首先，國家在國際社會中，都具有一定的位置，是由國家統治者來決定其性質與發展。至於類屬身份，則是從政治體制的種類來區隔，國家是屬於民主、獨裁、專制等等種類。

角色身份則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中透過互動，產生相應的友好、敵對、互補、互利等身份關係。前兩種是國家自由主導可以形成的身份關係，後兩者必須在國際社會與其他行為體互動才可以實現的身份現象。其中，「集體身份」是把「自我」與「他者」的關係，透過邏輯演變的結果，亦即「認同」(identification)(Wendt, 1999: 229)的過程。認同涉及擴展自我的邊界使其包含他者，透過「角色身份」與「類屬身份」的建立，也超越上述兩種身份的整合結果。

¹¹ 此一部份論述，請參考Wendt(1999: 193-245)。

另外，「集體身分」具有因果力量，讓自我利益與他者利益合為一體，而形成利他主義的現象，深化產生群體的認同，進而讓國家認為要遵守某些規範甚至負有一定責任。例如冷戰時期，台灣自詡為反共陣營的先鋒，與美國反共利益一致，內化了美台的集體認同，甚至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參與美國亞洲圍堵共產主義的機制；但是國共金馬外島衝突時，台灣遵守了反共集體利益的認知，被迫自大陳島撤軍，產生了利他（美國）的行為，確認了雙方的集體身分。

溫特認為處於洛克文化的國家相互往來，可以推動集體身份的形成，包括第一類，是集體身份形成的主動或有效的變項：「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共同命運」（common fate）、「同質性」（homogeneity），第二類因素：「自我約束」（self-restraint），是助然或許可原因。四種變項的重要意義在於減弱「利己身份」，幫助建構「集體身份」。在同一情景中，四個變項可能都會存在，其存在程度越高，集體身份形成的可能性越高。因此，形成集體身份的一個必要條件：一個有效原因變項與自我約束變項的結合。「自我約束」發揮關鍵性作用，讓國家可以解決阻礙「集體身份」形成的根本問題：克服被他者吞沒的恐懼（Wendt, 1999: 343-44）。

第一、相互依存：如果互動對一方產生的結果取決其他一方的選擇，行為體就處於相互依存狀態。相互依存可以存在於朋友之間或敵人之間，同時必須是客觀的存在，而非主觀的盼望。因為一旦集體身份存在，行為體就會把對方的得失作為自己的得失。

第二、共同命運（common fate）：行為體具有共同命運是指他們的每個人的生存、健康與幸福取決於整個群體的狀況（Sterelny, 1995: 155-83; Wendt, 1999: 349）。如同相互依存一樣，只有當共同命運是客觀條件時，才能夠成為集體身份形成的原因。典型的共同命運是由一個群體面臨的外來威脅所造成的，可能是一種社會性質，也可能是物質性的。例如：美國原住民相互間沒有互動關係，但是，相對歐洲人來說，他們確有著共同命

運，因為歐洲人把他們再現為野蠻人，並把他們作為野蠻人對待（Wendt, 1999: 349）。

第三、同質性（相似性）：組織行為體在兩方面相似：團體身份與類別身份，團體身份指行為體在基本組織型態、功能、因果權力等方面的相同性。溫特提出一個假設：客觀同質性程度的增大可以使行為體重新認定其他行為體是自己的同類，並會以兩種方式促進認同的產生，其一、減少由於團體或類別身份不同，而導致的衝突的數量與嚴重程度；其二、透過直接的作用：行為體根據將他們構成群體的特徵相互視為同類（Wendt, 1999: 349）。

第四、自我約束：以上三種（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都是集體身份形成的有效原因，因此也是結構變化的有效原因。行為削弱自我的利己邊界，並將這一邊界擴大到能夠包括他者的範圍。不過，此一進程只有在行為體克服了被將要與之認同的行為體吞沒（實際上或心理上）的擔心之後，才能的以進展。

基本上，自我向他者轉達了對他者個體性的尊重，由於自我的自制，使他者能夠放棄自己個體性中的利己成分，願意與自我認同。是以，自我約束是集體身份和友好關係的最根本基礎。所以，集體身份從根本上言，並非植基於合作行為，而是根植於他人對自己的差異表現出來的尊重（Wendt, 1999: 357-60）。

溫特提出國家知道其他國家會「自我制約」的三種途徑（Wendt, 1999: 360-62）：第一種國家通過不斷地服從規範，逐漸將「多元安全共同體」（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的制度內化到第三等級，此種持續的服從往往會造就身份與利益的概念。在這情景中，「相互性」（reciprocity）扮演關鍵性角色，正是通過相互性的機制，國家相互學會了遵守制度是值得做的事情。

第二種回答：通過國內政治的方式。在國際環境允許下，國家往往會在其對外政策行為中，外化或外移其國內體制，換言之，有些國內的作法

在對外政策中不利於自我制約，但是有些作法卻有利於自我制約，例如民主制度國家，基於決策過程與民意輿論的監督，會產生某種程度的約制效果。

第三種方式：通過單方面行為減輕他者關於自我意願的擔心，例如，一方可以單方放棄某些技術、從佔領土地上撤軍、建立憲法體制限制國外使用武力、或將自己的對外政策納於集團管理之下。如此自我犧牲的作為，只有在一個國家相信他自己不會因之遭受傷害的結果才會產生，這也是自助體系最不容易產生的信念。一個國家有必要發自內心地降低對自己面臨威脅的估計，這可能是自我束縛的一個先決條件（Wendt, 1999: 360-62）。

三、建構主義下的機制與過程互動分析圖

首先，透過上述的「圖 2：國際行為體互動架構圖」，瞭解國家行為體在國際社會中，與其他行為體的互動過程中，產生三種國際無政府文化，進而確定國家的身份與其相對應的利益與戰略。本文在論述溫特建構主義的身份的類別，尤其是「集體身份」型塑過程中，必需強調的必要條件：「自我約束」，與其他助然條件之一的建立，才能建立符合一國需求的「集體身份」。同時，藉由下列「圖三：國際社會中機制與過程互動分析圖」，瞭解行為體的互動過程，所歷經的機制與過程對行為體的制約關係，進而提出台灣制訂安全戰略的應有思維。

從圖 3：國際社會中機制與過程互動分析圖，可以瞭解國家的安全戰略與對外政策的輸出，都應該有一種互動式的思考，不能從單面向來追求其國家利益，同時要思考相應的一方的認知，當然，互動的兩造之間必需先釐清其身份為何，才能有效瞭解其後續的政策的有效性。

總之，本文運用影響「集體身份」的必要條件：「自我約束」與其他三個充分條件：「同質性」、「共同命運」與「相互依存」，並透過「圖 3：國際社會中機制與過程互動圖」，來檢視一年來馬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與作為，以評估建立兩岸集體身份的內涵，以及未來理想中的國家安全戰略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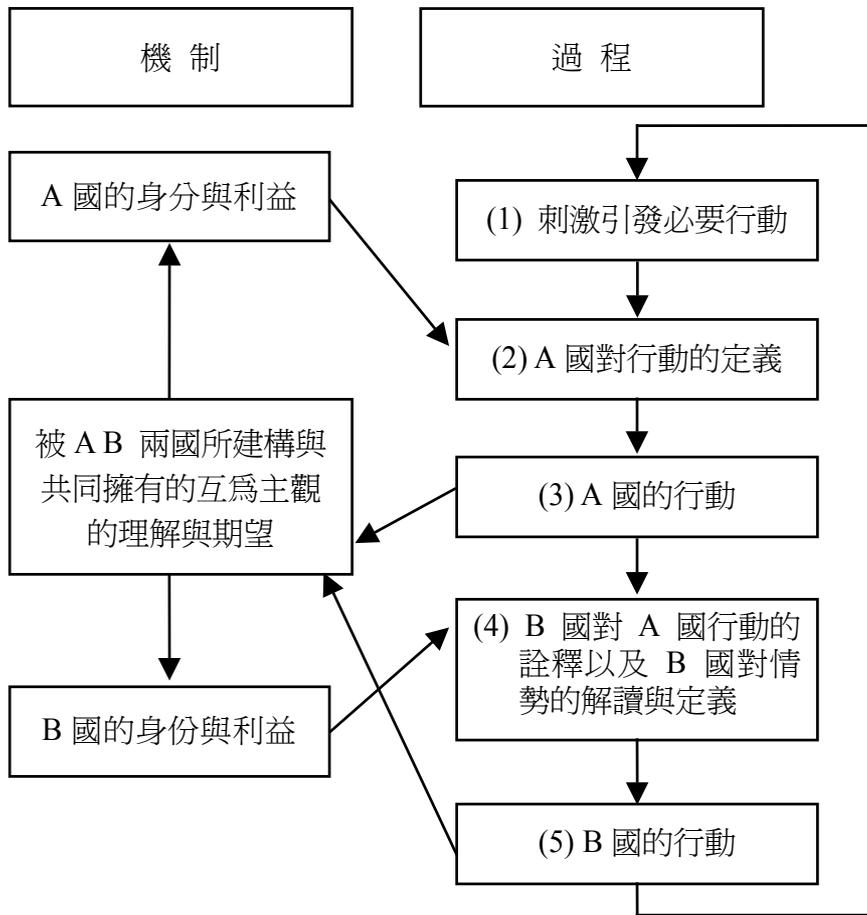


圖 3：國際社會中機制與過程互動分析圖

資料來源：Alexander Wendt (1992: 406)。

說明：(1)「機制」與「過程」兩者共同運作，進而影響行為體的「身份」與「利益」；(2) 從過程面來看，行為體受到刺激引發必要的行動，引導 A 國對於情勢的界定，進而指導 A 國的行動；由於 A 國的行動，讓 B 國解讀 A 國行動的意涵，B 國同時也對情勢作自我解讀，從而指導 B 國的行動；(3) 從機制面分析，A、B 兩國的行動結果，促成 AB 兩國擁有與建構之互為主觀的理解與期待；進而指導 AB 兩國形成其各自的身份與利益；(4) 從機制與過程面共同分析，A 國所具有的身份與利益，再度影響其對情勢的定義；B 國所具有的身份與利益再度影響其對 A 國行動的解讀，以及本身對於情勢的研判；進而再度指導 B 國的行動，並再次循環引發刺激與必要行動。

伍、建構台灣的國家安全：「雙重平衡戰略」的思考

從建構主義的觀點思考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必需先理解兩國之間的無政府文化，透過不同程度的互動過程中，型塑國家相互對待的身份。如果是「霍布斯無政府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體現出「敵人」、「競爭者」與「朋友」的基本立場。以往包括兩蔣時期、李登輝時期與陳水扁執政時期，兩岸基本上處於敵對狀態，在互動過程中，自然呈現敵對與衝突的政策與作為。但是，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卻呈現交流頻繁、互動熱絡的現象，自然無法通過傳統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加以分析。

關於馬英九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為何？前國安會秘書處處長劉湘濱認為：「從戰略的角度，這個政府根本不懂戰略，戰略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是目標是什麼？因為沒有目標，沒有方向，老百姓才會問『馬英九到底要把我們帶到哪裡去？』他到現在講不出來，所以我很肯定他沒有戰略。」同時，「這個執政團隊沒有國家階層戰略的概念，思維與邏輯，也沒有受過正規戰略的教育。當然也沒有實作經驗，不知道如何採取戰略的步驟¹²。」

2010年的元旦文告，馬英九總統以「改革奮鬥、台灣再起」為題，在兩岸關係方面，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狀態，並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兩岸交流與合作。馬總統強調這不是消極的維持現狀，而是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讓台海持續和平發展，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增進瞭解、淡化成見，並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秦蕙媛，2010a）。

另外，馬總統強調兩岸關係的緩和，獲取國際社會普遍的肯定，以往

¹² 劉湘濱特別強調：「馬總統對於如何運用國安會沒有概念，他可能還停留在二十多年前他當總統府一局副局長時的印象，以為國安會就是一年開個會審預算，他並沒有重視國安會，你看他在整個運作上，看不出國安會有在整合協調。」同時，「我至今沒有看到總統把國安會當成府與院的平台，過去的總統透過高層會議或國安會議，把國安會當做與院或各部會政策溝通的機制，但現在沒有了。」參見鄒景雯（2009）。

許多國家迴避台灣，擔心捲入兩岸的對立情勢。不過，在兩岸和解之後，開始與台灣商談免簽證待遇或是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更多國家願意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與相關活動（秦蕙媛，2010a）。在最近一期的「治國週記」上，馬總統強調：「台灣與大陸討論有關 ECFA，就是說有關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沒有包括開放大陸的農產品到台灣來，所以請所有的農民同胞放心，沒有要開放。所以我要強調，ECFA 不會開放大陸農產品進來，也不會開放大陸勞工到台灣來，請所有農民同胞放心。」（江昭倫，2009）

整體而言，馬英九總統的元旦祝詞提出在國際社會台灣象徵的意義除了「自由、民主、繁榮」，又增加「和平」一項，亦即經過「兩岸和解」、「美台合作」，爭取一至兩代的和平來發展台灣，一方面等待中國變化，也爭取國際社會支持，至於統獨問題，則由未來的台灣人民決定（范凌嘉，2010）。同樣的，中國時報也認為馬總統希望在任期以內，堅持「三不」狀態與「九二共識」基礎上，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為台海換來三、五十年的和平環境。而「統獨問題」，已經成為「沒有必要也沒有辦法去碰觸的問題」，企圖淡化統獨成為影響兩岸關係的變數（秦蕙媛，2010b）。

基本上，從馬英九執政以來，「兩岸優先」的政策作為，已經成為民眾心目中的印象。在 2010 年元旦提出的「兩岸政策」與「國際關係」同步進行，平衡發展的思維，表明修改兩岸優先政策，轉移「傾中」的印象。殊不知，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問題，追根究底在於國內共識不足，所引發的一連串後續效應。換言之，因為國內統獨爭議，使得台灣的自我定位、兩岸定位產生歧異，究竟兩岸關係是何種關係，自然就牽動台灣如何面對中國的立場，同時也影響台灣在國際間的地位問題。因為，北京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運用各種方式來阻擾台灣以主權國家身份參與國際社會。上述一連串狀況，如果不從「國內共識」做起，釐清兩岸建立何種「集體身份」關係，兩岸之間會一直不斷進行「惡性循環模式」。是以，在「安內攘外」原則下，內部要在國家定位與發展上先建立共識，確立兩岸幽有的身份之後，才能據以建構國家安全的大戰略。

同時，在美國牛肉開放進口問題上，牽涉到台灣與美國、中國的關係，一方面兩岸加強雙邊關係的發展，簽署高達十二項協議，但是，台美關係呈現停滯，蘇起強調：「台灣不能一邊『拼命掛牌』、一邊『拼命掛零』，台美和兩岸的雙邊關係都需維持平衡。」（陳林幸虹，2009）基於牛肉是美國政府最關心的課題，同樣台北也希望透過擴大進口，向美方釋出善意，進而拓展雙方的經貿關係。同時，如果立法院進行美國牛肉的修法工作，會造成三大後果：其一、衝擊台美經濟關係；其二、衝擊台美非經濟關係，包括與美國國會人事相關交流；其三、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支持度也會下降（陳林幸虹，2009）。

依照建構主義的身份主導利益，利益規劃戰略與政策的設計來分析，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應該不是單純的「和中、友日、親美」的指導原則，因為此一原則並沒有讓台灣跳脫「美中」兩強與「美中台」三邊的戰略架構。加上，美中兩國的戰略結構也有調整，例如 2009 年 12 月 19 日，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主辦之「未來十年中美關係」研討會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王緝思認為，傳統的思維方式認為美國的損失，就是中國的好處，此種思維應該加以調整。美中之間要相互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

同時，根據 2009 年 12 月 24 日，2010 年世界經濟與國際情勢報告會暨「世界經濟黃皮書」與「國際形勢黃皮書」的發佈會上，中國學者李少軍強調兩項因素主導世界格局的發展，其一、歐巴馬主政之後的新國際戰略，包括：從伊拉克撤軍、改善與俄羅斯關係、撤銷在東歐地區部署飛彈防禦系統，在國際安全領域方面，歐巴馬提出「無核世界」，強調「對話」與「和解」的外交姿態；其二、新興國家在國際舞台上作用增加，表明其「地位」與「話語權」，影響國際重要議程的進展¹³。

¹³ 所謂新興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巴西，越南、南非、土耳其等等，尤其在 G20 發揮主導處理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已經取代 G7，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參見師子奇（2009）。

是以，本文認為台灣應該採取「合縱」與「連橫」的「雙重平衡」戰略思考，所謂「合縱」戰略在於以台灣為主體性，強化與現有二十三個邦交國關係，在全球化下，因應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緊迫的態勢下，建立「共同家園」為理念，協助邦交國有效治理，發揮台灣的相對優勢，讓台灣成為某種程度的領導國家。

在「連橫」戰略方面，思考傳統安全威脅依舊存在，台灣必需聯合友我之國家包括：美國、日本與歐盟國家，建立「安全社群」為目標，發揮台灣的「軟權力」為指導原則¹⁴，透過：塑造國際形象、主導國際議程、強化對外政策為方向。上述「連橫」與「合縱」兩種戰略思考，不能有所偏廢，採取平衡的態度，才能讓台灣脫離傳統國際體系結構的約制，主動性的積極作為，才能廣結善緣，發揮台灣的優勢利基，既可掌握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又能兼有建構主義對國家安全的作為。

在對美、日與中等三個雙邊關係方面，透過「國際社會行為體互動過程圖」，台灣必需要思考透過國際無政府文化與此三國建立何種身份關係？筆者認為與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建立「安全互助」之集體身份；與中國建立三重「集體身份」關係，包括：「經濟互補」、「安全保證」與「主權對等」之集體身份。與日本則建立「相互協作」之綜合集體身份。

首先，在美國方面，由「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 2009年12月出版一份由其亞太計劃主任丹麥(Abraham Denmark)與資深研究員方登(Richard Fontaine)共同分析，有關兩岸關係的報告指稱，美國政府應該採取具體步驟，支持兩岸的「和解」，讓兩岸和解為台灣帶來利基，同時協助台灣降低與中國積極交往所造成的安全風險(季平，2009)。

「新美國安全中心」提出三項措施：第一、拓展與台灣的貿易關係，對尋求拓展與台灣貿易關係的國家給予外交支持；第二、繼續軍售台灣；透過台灣四年一度的「四年期中國防總檢討」，協助台灣分析防衛態勢；

¹⁴ 關於奈依的「軟權力」的理念，請參見 Nye (2004)。

第三、派出高級官員，表達對台政治支持（季平，2009）。在報告中特別強調，馬英九總統推動的兩岸和解政策，是一項重大政治賭注，華盛頓應該調整期對台策略，以鼓勵台北此種負責任的策略的持續。是以，推動與美國建立「安全互助」集體身份，並非單純的軍事採購，從複合安全角度言，更應在民主、政治與人權方面加強雙方的合作。

第二、面對中國對台進行三個協議的簽訂，包括：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軍事安全互信機制與和平協定，台灣應該透過交流與互動，與中國應該建立三種集體身份，其一、「經濟互補」身份，透過此一身份，才能確立與北京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對台灣是有利可圖。其二、「安全保證」身份，要求北京具體承諾放棄武力犯台、撤除沿海飛彈；「主權平等」身份方面，先從國內建立兩岸定位的共識，型塑兩岸對等政治談判的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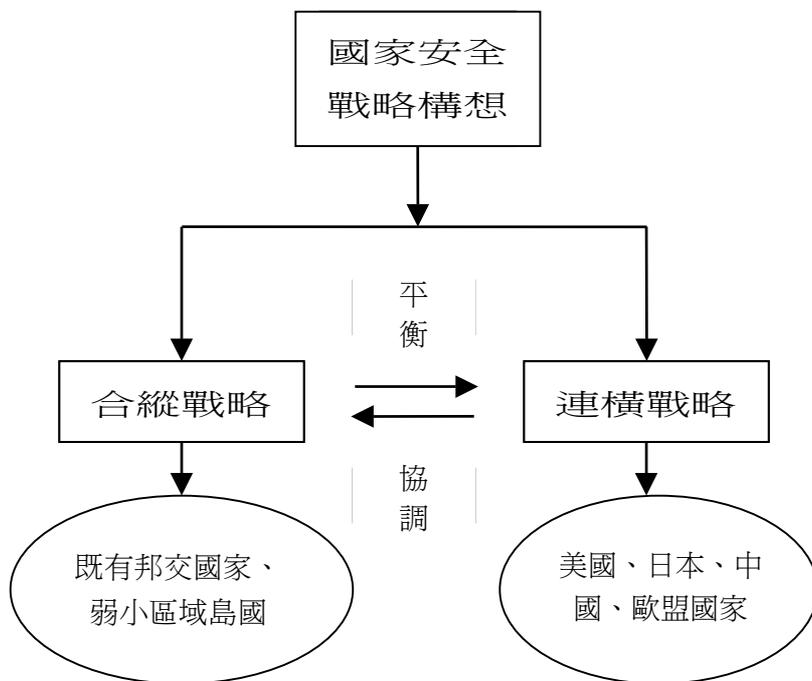


圖 4：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構想圖

在「雙重平衡」戰略架構下，台灣必需採取「嵌入式」策略的設計，在全球化與資訊化高速發展態勢下，加上經濟利益複合式依存，在國際安全、國際經濟、國際政治方面，讓台灣與「連橫」戰略設計下的國家緊密在一起，例如，將台灣的安全與「美日安保同盟」與日本一千哩海上生命線相互結合，或是未來面對崛起中國時，美台具有相同戰略目標，並與歐盟國家建立「遠交」的合作契機。並透過國際合作與開發能量，將台灣與「合縱」思考下的小國，嵌入台灣的整體國家利益中，讓台灣成為小國發展的領頭羊。

陸、結語：兼論淡江戰略學派構建之芻議

首先，國家安全戰略研究歷經冷戰、後冷戰與後九一一時期，以國家為主體，思考安全議題並沒有改變，只是國家面臨更多傳統與非傳統威脅的交相影響，更難以個別國家力量，來解決面臨的安全問題。所以，建構主義透過無政府文化、認知的互動，確立行為體的相互身份之後，才能主導國家利益，與其後的戰略與政策的推動。換言之，國家追求利益，也必需考量相對一方的利益需求，往往雙方的身份會主導其利益的走向，有意義的轉移安全戰略的研究典範。

此外，在全球化下，台灣面臨複合式的安全威脅挑戰，必需跳脫傳統角度，以另類思考來觀察國家安全戰略。事實上，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戰略研究上，出現許多的研究學派，從世界重要學派的發展過程來看，都有其歷史、地緣、主要領導人與社群的建立。Kubalkova 所撰寫的一篇有關〈學派的建構：學者扮演能動者〉，提出國際關係學派之所能夠在美國成其氣候，變成一個社會關係的能動者，端賴一系列社會關係的交互影響的結果，包括：社會、對外政策、國際社會及其能動者、國際關係理論學派本身、上述教導未來能動者的課程等五項（Kubalkova, 1998: 194）。

例如：「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中的「英國」是指這一流派的大多數跟隨者，都曾經與在英國從事研究。其實，這些學者的背景具有多元化現象，換言之，「英國」一詞所引發的作用，提醒眾人英國學派過去是、現在也是根基於某個歐洲帝國與大國的國際經驗之中（Neuman & Wæver, 2003: 58）。另外，中國學者秦亞青認為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有其形成與必然產生的背景，因此提出建構「中國學派」的兩個特色：一、起源於中國的地緣文化語境的理論；二、在發展過程中能夠獲得普遍性的意義（秦亞青，2006）。同時，三種中國古代思想與政治實踐淵源激發「中國學派」的形成，其一、儒家文化的天下觀與朝貢體系的實踐；其二、中國近代主權思想與中國革命實踐；第三、中國的改革開放思想與融入國際社會的實踐（秦亞青，2006）。

事實上，「淡江戰略學派」此時興起，正逢其時。魏萼教授很早就呼籲要建立「淡江戰略學派」的思考，他認為從學術發展的「多元一體」，到「一體多元」的角度，重點在於「體」字，亦即「定位」問題¹⁵。魏萼提出司馬遷在「太史公序」上所強調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究天人之際」在於探討「天道」與「人事」之間的關係，司馬遷強調社會現象是由人的活動所構成的，而「通古今之變」就是瞭解歷史的發展歷程，尋找歷代王朝興衰的道理；最後，「成一家之言」則是表達司馬遷透過「史記」一書，表達其獨到的歷史見解，與對社會或政治現象的看法（無作者，2009a）。

換言之，如果「淡江戰略學派」成立，必需建立自己的「思想」，主導「理論」的發展，進而形成一套「政策」，能夠符合時代的需求，被社會大眾所肯定，又能夠解決一些國家所面臨的關鍵課題，並能為社會大眾所肯定。因此，「淡江戰略學派」要先自我「定位」，建立發展架構，透過志同道合人，提出自己的「學術主張」共同來推廣。

¹⁵ 魏萼教授有關「淡江戰略學派」一段話，發表於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上，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T306 會議室，2009 年 12 月 28 日。

從淡江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的角度言，「通古今之變」，符合本所的教育宗旨：以「國際事務」為本，藉由「戰略研究」為體，進行國際問題與國家戰略的探討。而「究天人之際」在於瞭解國際間各種行為體的互動過程，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過程。而「成一家之言」，從淡江戰略所的觀點論述國際事務與戰略問題，都有不同於外界的獨到觀點。

另外，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成立於 1982 年，是台灣民間最早成立的戰略研究機構¹⁶，並可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傳統時期」（1982-90）：古典中國戰略思想研究時期，在淡江大學創辦人張建邦博士的指導下，從早期蔣緯國將軍、許智偉教授等人奔走，創立戰略研究所，在鈕先鍾、皮宗敢、張式錡、李子弋、孔令晟等戰略研究者老的戮力經營下，奠定深厚基礎，尤其是鈕先鍾老師著作、翻譯、發表等身，被譽為兩岸戰略研究第一人。

第二階段「多元時期」（1990-2009）：引進西方國際事務與戰略理論階段：聘請國內許多國際關係、國家安全專家學者，使得淡江戰略所跳脫純粹以中國古典戰略研究為基礎的思考與研究途徑。在此一階段強化與國防實務界的合作關係，使得理論與實務更加完整。已經逐漸型塑具有特色的學術風格，是以，淡江戰略學派在此傳統與多元學風，融入創新精神與團隊默契，開啓第三階段的「創新時期」（2010 年起）。

是以，淡江戰略學派的傳統學風在於：以務實的教學與研究，面對台灣真實的戰略問題。亦即「入世」角度，提出解決台灣面臨的安全問題，以台灣為主體的戰略研究與建構，是一貫的傳統學風，也是未來堅持發展

¹⁶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是國內歷史最悠久，以國際事務為背景，戰略研究為主體，從事國家安全、軍事戰略、區域安全與國際組織的研究所。當初設立時，教育部對於所之名稱有不同的看法，認為文人學校，尤其是私立大學何以有能力進行軍事戰略的研究，當時不能直接以「戰略研究所」名義，只能以「國際事務與策略研究所」申請籌設研究所，經過一年以後，才更名為目前沿用的「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以下簡稱淡江戰略所）。從 1982 年創所以來，歷經武人主導、軍文並重，到目前以文人為主的研究。淡江戰略所目前開設一般碩士班，1999 年開設碩士在職專班，2006 年開創博士班，形成完整的戰略研究養成體系。

的道路。同時，本學派強調科技合作與多元發展，重視質化與量化的研究途徑，將是本學派迎向全球化與資訊化世界的利基所在。

此外，淡江戰略學派崇尚團隊的學術默契，強調核心與特色課程的均衡發展，並鼓勵進行深入的延伸研究，展現出一種教師同儕與師生之間的默契，這也是淡江戰略學派的最重要資產。希望淡江戰略學派的宣示，開啓淡江戰略所成爲台灣「學術之重鎮、國家之干城」的發展願景。在此「淡江略學派」發展願景下，預計從事一系列「淡江戰略叢書」的出版工作，藉以建構厚實的基礎研究與運用理論之研究，讓淡江戰略學派與淡江戰略所相互結合，才能真正有效開創台灣戰略研究的創新風潮。

參考文獻

- 方長平。2002。《國家利益的建構主義分析》。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
- 朱立群。2002。《歐洲安全組織與安全結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江昭倫。2009。〈簽署 ECFA 馬總統保證不增加大陸農產品進口項目〉《中央廣播電台》12月26日（<http://news.rti.org.tw/index-newsContent.aspx?nid=227923>）（2009/12/26）。
- 江慧真。2009。〈馬政府國安戰略思維，和中友日親美，誰也得罪不起〉（<http://blog.sina.com.tw/cnear/article.php?pbid=33723&entryid=624605>）（2010/2/3）。
- 李少軍。1998。〈論安全理論的基本概念〉收於資中筠（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頁144-7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際均。2001。《論戰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季平。2009。〈美智庫：華府應以行動，支持台灣的大陸政策〉《中央社》12月23日（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227678）（2009/12/26）。
- 林沂鋒。2008a。〈馬英九——兩岸處於一種特別的關係 但非國與國〉《大紀元》9月3日（<http://www.epochtimes.com.au/b5/8/9/3/n2250675.htm>）（2009/12/26）。
- 林沂鋒。2008b。〈馬英九——兩岸主權爭議 以 92 共識做暫時處理〉《大紀元》9月3日（<http://www.epochtimes.com.au/b5/8/9/3/n2250694.htm>）（2009/12/26）。
- 林沂鋒。2008c。〈馬英九——國防不採取攻勢 戰略上一定採取守勢〉《大紀元》9月3日（<http://www.epochtimes.com.au/b5/8/9/3/n2250749.htm>）（2009/12/26）。
- 林曉雲。2009。〈台生中國求學 擬限41校2000人〉《自由時報》12月24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doc/24/today-life9.htm>）（2009/12/28）。
- 柳豐華。2009。〈中評——俄國家安全戰略 影響國際格局〉《中國評論新聞網》5月25日（<http://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7/5/9/100975976.html?coluid=137&kindid=4734&docid=100975976&mdate=0525003055>）（2009/12/25）。
- 范凌嘉。2010。〈跳出統獨，不同李扁〉《聯合報》1月2日，A3版。
- 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2001。《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師子奇。2009。〈李少軍：09 世界格局兩大變化 中國需用新戰略應對挑戰〉《中國經濟網》12月24日（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0912/24/t20091224_20682262.shtml）（2010/2/3）。
- 倪世雄。2001。《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秦亞青。1999。《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爲（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秦亞青。2006。〈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治》3期，頁5-8（http://www.iwep.org.cn/download/upload_files/ms421dn4txiykbvzemffbva020071021134542.pdf）（2010/2/3）。
- 秦蕙媛。2010a。〈馬：兩岸、國際關係，都不偏廢〉《中國時報》1月2日，A4版。
- 秦蕙媛。2010b。〈不碰統獨，換50年和平〉《中國時報》1月2日，A4版。
- 秦蕙媛。2009。〈馬：不會賣台，只賣台灣水果〉（<http://n.yam.com/chinatimes/politics/200912/20091227394437.html>）（2010/2/3）。
- 翁明賢、吳建德。2006。〈全球化下非傳統安全威脅、集體身份與國家利益的互動關係〉收於翁明賢，吳建德，江春琦（編）《國際關係》頁183-226。台北：五南。
- 翁明賢、李黎明。2007。〈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威脅與戰略因應〉收於翁明賢、吳建德、王偉琦、張蜀誠（編）《新戰略論》頁357-72。台北：五南。
- 翁明賢、周湘華。2006。〈建構國家利益的評量指數——兼論台灣軍事戰略的思維〉收於王高成（編）《台灣的戰略未來——建構二十一世紀台灣的戰略定位與策略》頁223-73。台北：華揚文教。
- 翁明賢。2008。〈美中互動下的中國國家身份、利益與安全戰略〉收於翁明賢、王瑋琦、吳建德、曹金增、張蜀誠（編）《全球戰略形勢下的兩岸關係》頁307-30。台北：華立圖書。
- 翁明賢。2009。〈建構兩岸集體身份下台灣的安全戰略〉收於王高成（編）《兩岸新形勢下的國家安全戰略》。淡水：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
- 馬維野。2001。〈國家安全、國家利益、新國家安全觀〉《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6期，頁14。
- 劉曉霞。2009。〈陸委會向使節說明江陳會 簽 ECFA 後談安全〉（<http://news4.pchome.com.tw/politics/cnyes/20091228/index-12619970690640409001.html>）（2010/2/3）。
- 國家安全會議。2008。《2006 國家安全報告》（修訂版）。台北：國家安全會議。
- 張之傑、黃台香。1984。《名揚百科大辭典》（上冊）。台北：名揚出版社。
- 陳必照、林正義。1995。《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政策——大陸、外交、國防、經貿四合一政策的建構，台灣的國防安全》。台北：業強出版社。
- 陳亦偉。2008。〈事大國以智 馬英九提國家安全 SMART 政策〉《中央社》2月26日（<http://n.yam.com/cna/politics/200802/20080226495034.html>）（2009/12/26）。
- 陳林幸虹。2009。〈蘇起：若違反台美牛肉議定書，恐有三大後果〉《中央廣播電台》12月24日（<http://news.rti.org.tw/index-newsContent.aspx?nid=227732>）（2009/12/26）。
- 程天放、張彝鼎。1973。《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四冊——國際關係》。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楊偉中。2009。〈五大軸線建構馬英九兩岸政策〉《Hinet 新聞》5月6日 (<http://times.hinet.net/times/magazine.do?magid=5425&newsid=2125943>) (2009/12/26)。
- 鄒景雯。2009。〈『星期專訪』劉湘賓：馬英九團對毫無國家戰略觀〉《大紀元》6月1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9/6/1/n2543680.htm>) (2009/12/26)。
- 薛釗。2001。《戰略性思考》。台北：時英出版社。
- 龐中英。2002。《權力與財富——全球化下的經濟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無作者。2009a。〈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什麼意思？〉《天涯社區》2月7日 (<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52c24ce792e09683>) (2009/12/30)。
- 無作者。2009b。〈專家：警惕敵靈巧謀殺 加強國防刻不容緩〉《中國評論新聞網》8月26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5/8/3/101058368.html?coluid=0&kinkid=o&docid=101058368>) (2009/12-25)。
- Beard, Charles. 1934.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An Analytical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Brown, Harold. 1983. *Thinking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Bull, Hedley. (張小明譯)。2003。《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Buzan, Barry. 1991.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nd ed. Bright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Cimbala, Stephen J. 1984.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hoices and Limit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Clinton, W. David. 1994. *The Two Faces of National Interes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onnolly, William. 1983. "The Important of Contests over Interest," in William Connolly, ed.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pp. 46-8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quoted by Alexander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232.
- Derian, James Der (秦治來譯)。2003。《國際關係理論批判》(*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Friedrich, Carl J. 1962.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Beresford Book Serv.
- Fukuyama, Francis.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Vol. 16, Summer, pp. 3-18.

- Haftendorn, Helga. 1991.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1, pp. 3-17.
- Keohane, Robert. 1984.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slowski, Rey, and Friedrich V. Kratochwil. 1994. "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oviet Empire's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pp. 215-47.
- Kubalkova, Vendulka. 1998. "Re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e: Scholars as Agents,"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pp. 193-201. Armonk, N.Y.: M. E. Sharp.
- Manwaring, Max G., Edwin G. Corr, and Robert H. Dorff. 2003.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 U.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 May, Ernst R. 1992. "National Security in American History," in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eds. *Rethinking American's Security: 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 pp. 94-114.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Mearsheimer, John.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pp. 5-56.
- Neuman, Iver B., and Ole Wæver. (蕭鋒、石泉譯)。2003。《未來國際思想大師》(*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Nye, Joseph N.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Nye, Joseph S.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trick, Stewart. 2002. "Multilat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Ambivalence,"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Ambivalent Engagement*, pp. 1-44.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Posen, Barry R., and Andrew L. Ross. 1997.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pp. 1-49.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Roskin, Michael G., Robert L. Cord, James A. Medeiros, and Walter S. Jones (劉后安、洪聖斐譯)。2002。《政治學的世界》(*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台北：時英出版社。

- Schubert, Glendon. 1960. *The Public Interest: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a Political Concept*.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Sterelny, Kim. 1995. "Understanding Life: Recent Work in Philosophy of Biology."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46, No. 2, pp. 155-83
- Walt, Stephen M.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 110, pp. 29-46.
- Waltz, Kenneth N. (信強譯)。2003 (1979)。《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2, pp. 391-425.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lfers, Arnold. 1962.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he Paradigm Shif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amkang School of Strategic Studies

Ming-Hsien Wo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Taipei, TAIWAN

Abstract

Since the emerging of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fter the Cold-War, 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theories can't fully explicate the essence and contents of national interest and security strategy. Hence, through the idea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 identity define national interest and policy – author like to propose another thinking of Taiwan's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assessment of construct a Tamkang School of strategic studies. First of all, I explain the concepts and contents of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n I examine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theories. Thirdly, I analyze the key theories and approach of constructiv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s Dual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y. Finally, I suppose under advantage of time and space, it's time for us to build the Tamkang School of Strategic Studies.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rategy, Constructivism, national interest, Tamkang School of Strategic Studies